

风云激荡时代的报刊与人物风流

——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报业与报人分析

黄朝钦

摘要：文章梳理了辛亥革命时期浙江进步报人在省内（杭州、宁波、绍兴、金华、湖州）、省外（上海）和海外（东京）的主要报刊活动，并总结该时期浙江进步报人及其报刊活动的特点为激进、业务创新多、群体规模和影响力大。这些报刊活动不仅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还丰富并发展了我国的新闻事业史，也为民国新闻业奠定了基础。文章最后还指出，当时进步报人的报刊思想中存在着较浓的工具理性色彩及一定的狭隘地域意识。

关键词：辛亥革命；浙江；革命报刊；浙江籍报人

作者简介：黄朝钦，男，副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浙江万里学院 文化与传播学院，浙江 宁波，315100）

中图分类号：G219.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5）02-0010-13

学界有一个流传甚广，但出处已不可考的说法：“一部民国史，半部在浙江”，尽管这只是对历史的非学术和非精确概括，但也大致道出了一些实情。这个断语试图说明浙江在近代中国政治格局中的非同寻常的位置，其背后也蕴含了地域因素这一考察政治的重要维度。

地域因素不仅适用于分析民国史，用来分析辛亥革命史或辛亥革命期间的专题史（如文化史、社会史、新闻史、商业史等），同样具有方法论价值。因为民国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直接脱胎于辛亥革命。辛亥革命时期（指1894—1912），^①浙江省产生了数量较大、种类繁多的新式报刊，其中大多数报刊都积极传播进步思想，直接或间接推动了辛亥革命在浙江省内乃至全国的进程。这些报刊的主持者和主要撰稿人有些是革命志士，有些是倾向进步的专业报人，有些则兼而有之，他们的报刊活动及其间对报刊业务、功能与作用的思考一方面促进了革命宣传工作的开展，另一方面也发展和丰富了地方及全国的新闻实践与理论，为民国及其后我国新闻事业的开拓奠定了基础。

一、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省内进步报业概况

自1894年孙中山在旧金山成立兴中会后，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便在海外中国人当中萌芽。1898年维新变法的失败，更助长了革命情绪的发酵。而海外留学生和华侨是早期的革命依靠力量和参与者。1905年同盟会创办《民报》并从日本传入国内，对国内的激进知识青年影响很大，清廷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行动迟缓和其后的“皇族内阁”更是加速了末世王朝公信力的衰微，同时也促进了革命势力的成长。作为革命宣传重要工具的报刊，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纷纷创办于国内各重要城市和地区。

基金项目：2010年浙江省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项课题“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报业与报人研究”（10WHXH05）的成果。

^① 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分期有广义和狭义之说。狭义的辛亥革命特指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而广义的辛亥革命也有两种说法，一是指从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开始，到1912年初中华民国政府的成立；二是起点从1905年同盟会成立算起。本文遵从第一种广义的说法。

浙江的进步人士是这一革命大潮的积极参与者，也同样被时代的洪流席卷向前，在省内外组织社团、办报刊，宣传革命思想，发展同盟者，鼓动民众。

如果按照广义的说法来探讨辛亥革命时期的报业情况，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1894—1903，是维新报刊与革命报刊并存的时期，这一阶段维新报刊甚至在某些地区还占据主导；1904—1912，是革命派报刊占绝对优势的时期。整个辛亥革命时期，浙江各主要城市的革命派报刊或倾向革命的进步报刊也是由少到多，经历了从边缘到主流的发展过程，其中尤以杭州、宁波、绍兴三地的报刊规模和影响为大，金华、湖州、嘉兴等地也有不俗的表现。而且，不同地区的报刊整体上表现出了各自所在地域的特色。

（一）杭州的进步报业

从1894年初到1921年间，创办于杭州的报刊有近30种。^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经世报》、日商《杭报》、《杭州白话报》、《浙江五日报》、《浙江白话报》、《危言报》、《汉民日报》等数家。《经世报》和日商《杭报》还带有鲜明的改良立场，《杭州白话报》则呈现出由维新改良向民主革命立场的转变，《汉民日报》则是鲜明的革命立场了。

《经世报》和日商《杭报》的存续时间虽也在辛亥革命时期，但其性质与宗旨还是维新改良。可以理解的原因是，排满革命在19世纪末的中国并不是主流社会思潮。据台湾著名的史学家汪荣祖考证并分析认为，是三股势力促成了辛亥革命的成功，即革命派、立宪派、流民，其中立宪派和流民又是其中的主导。革命行动本身的影响很小，影响最大的还是它的宣传。^[1]

1. 《杭州白话报》：由改良向革命过渡的报刊

创刊于1901年6月20日的《杭州白话报》是辛亥革命时期浙江革命报刊最为突出的报纸，也是辛亥报坛全国影响较大、刊期最长的白话报。该报创办人为项藻馨，首任主笔为林白水。后由钟寅、汪嵒、童学琦等继任。该报编辑队伍中有一批思想比较开明的知识分子，热心传播新知识和新思想。《杭州白话报》在创办初期以“开民智和作民气”为宗旨，其立场和主导思想仍是维新改良。1903年夏，杭州人孙翼中应项藻馨之邀接任经理兼主笔，报纸立场开始转向革命。项士元在《浙江新闻史》中记述了这一变化：是报执笔人员，虽皆一时优秀，然多惑于科名，相率猎取高科他去；程光甫虽始终任事，但鲜发扬踔厉之精神，惟癸卯以后，孙翼中出任经理，始放异彩。后来，孙翼中加入光复会，从而使《杭州白话报》成为革命的舆论机关，报馆也成了革命党人的秘密联络点，报纸的反清立场更加鲜明。

2. 《汉民日报》：杭城的纯正革命报刊

1911年11月18日，即杭州光复后第13天，浙江军政府首任都督汤寿潜邀杭辛斋在杭州创办了《汉民日报》。杭辛斋任总经理，并邀邵飘萍担任主笔。《汉民日报》是辛亥革命后杭州出版的第一份报纸，是作为国民革命军浙江军政府机关报而存在的，“以尊崇人道，提倡民权，激励爱国尚武之精神，建设完全无缺之共和政府为唯一宗旨”。民国成立后，该报坚定地代表革命派利益，在邵飘萍的主持下，始终为民主共和政体的建立和维护而呐喊；袁世凯称帝后，该报坚持民主共和立场，不畏权势直言不讳，1913年8月10日被支持袁世凯的浙江都督朱瑞查封。

另有《危言报》，1909年创刊，主编费有容。1911年（宣统三年）改为《昌言报》，在杭州出版。该报以“提倡工商业为宗旨”。内容记载工商，报道新闻为主，偶尔也批评政界。

（二）宁波的进步报业

尽管宁波是浙江省最早出现近代报刊的地区，但宁波报界在戊戌变法期间的表现不仅远不及临近

^① 浙江新闻传媒发展演变年表（1854—2000），见王文科，张扣林：《浙江新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359—361页。

的上海和省城杭州,甚至也不如绍兴、金华和温州来得活跃,可谓寂寥沉闷,无所作为。但到了辛亥革命时期,风气为之一变,表现较为抢眼。

据可考的史料,辛亥革命期间,宁波创办的报刊有《德商甬报》、《宁波白话报》、《宁波新报》、《甬报》、《四明日报》、《天铎报》、《朔望报》、《武风鼓歙》、《宁波小导报》等近十种。其中影响较大的进步报刊是《宁波白话报》、《朔望报》和《武风鼓歙》。

1. 《宁波白话报》:处在改良与革命之间

《宁波白话报》创办于1903年,由在上海的宁波同乡会主办的一份白话文刊物,这也是宁波人最早的自办报刊,在中国的白话报刊中也是较早的一份。

《宁波白话报》由清末举人出身的陈训正(杞怀)任主编,主要撰稿人有钟观光、虞和钦、洪佛矢、马裕藻、郑棻等。该报以“开通宁波民智,联络同乡之感情”为主旨。每月出两册,自创刊至1904年6月,一共出过九册。根据上海图书馆所编《近代期刊总目》中所收该刊的目录来看,现存第二、第五、第六册。在这三册中设有“论说”、“评议”、“新闻”、“专件”、“指迷录”、“调查录”、“小说”、“歌谣”等栏。1904年6月曾进行大幅改版,增加了历史、地理、教育、实业、格致等栏目及相关内容,改版后又出五期才停刊。

《宁波白话报》的宣传内容是鼓吹实业救国、提倡移风易俗、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抨击清政府的腐败和媚外。主要读者对象是在上海的宁波人和宁波本地人,因此具有较鲜明的地方特色。《宁波白话报》的政治立场比较温和,未提出明确的革命主张,而是通过历史和现实的事实向人民揭露帝国主义对华侵略以及政府和官僚的腐败与无能,激发人民的爱国心和自强心,可以说是处在由改良主张向革命要求过渡中的一份报刊。

2. 《朔望报》:宁波第一份宣传革命的报刊

《朔望报》,1911年7月10日由应彦开(天恨)创办并任社长,沧浪和化尘任编辑,该报以唤起爱国思想、鼓吹尚武精神、灌输学术、针砭社会为宗旨。主要栏目有:社论、学艺、学说、文坛、诗词、图画、小说、谈丛、笑林、史传、记事、短评、专件等。上海图书馆藏有第一期。其发行情况及终刊时间不详。

3. 《武风鼓歙》:宁波革命团体的机关报

陈训正等人为把革命的火种引到家乡,会同同盟会会员范贤方、章述洩、林端甫等人,联系宁波士绅及各界领袖成立“国民尚武宁波分会”,是中国同盟会之外围团体,为建立革命武装作积极准备。鉴于宁波本地的革命宣传较为薄弱,陈训正等人在组织革命团体的同时出版了《武风鼓歙》,这是浙江省宣传辛亥革命的一份重要刊物,也是宁波本土第一份资产阶级政党报刊。

《武风鼓歙》于1911年9月22日创办,章叔言任主编,为国民尚武会宁波分会的机关刊物。《武风鼓歙》托词提倡尚武、兴办团练,公开以“阐明武德,激扬武风,使合邦人士皆有同仇敌忾之心,以合于军国民之资格”为宗旨,实则是“鼓吹革命,网罗人才”,为宁波光复作舆论准备。《武风鼓歙》为旬刊,每期约20页,设有论说、学术、国内大事记、本郡纪事、时评、稗乘等栏目。该刊终刊时间不详。

(三) 绍兴的进步报业

绍兴是浙江近代史上的报刊出版较为活跃的地区。辛亥革命期间,绍兴籍革命党人的主张和行动比省内其他地区的革命者更为激进。当时,绍兴创办的进步报刊有《绍兴白话报》、《绍兴公报》、《越恨》、《越报》、《越铎日报》、《越社丛刊》、《民兴日报》、《大夏丛刊》、《天觉报》等近十种。其中影响较大的是《绍兴白话报》、《绍兴公报》和《越恨》。

1. 《绍兴白话报》:绍兴第一份革命报刊

《绍兴白话报》创刊于1903年7月9日,开始为旬刊,后改为五日刊,创办人为光复会和同盟会会

员王子余，参与其事的还有陈仪、蔡元康和徐锡麟，徐还出资一百大洋资助。^[2]该报的宗旨为“唤起民众爱国，开通地方风气”，力图通过推广白话文进行民主革命的宣传。设有“论说”、“大事记”、“中国近事”、“外国近事”、“绍兴五千年人物谈”和“小说”等栏目。内容既具有一定的全国视野，又十分注意突显地方特色。在其一则招募访员的告示中说：“我们这个报，是着重绍兴地方的事体，务要把绍兴各县的要紧事件，都要打听出来，登在报上”。^①《绍兴白话报》在绍兴有一定影响力，还发售到省外，期发行量最多时达到千份。该报1907年曾一度中断，后复刊并出版至1911年11月终刊。

2. 《绍兴公报》：革命派的综合刊物

《绍兴公报》1908年创刊，为王子余、陈仪和蔡元康三人合资创办，编辑有刘大白和陈伯平等。该报宗旨与《绍兴白话报》相同，并宣称要“以正当言论为社会作导师”、“使旅游他乡者于故乡状况旦夕目击”。所刊内容除时事政治报道和言论外，还注意传播科学知识，如曾登周建人的《植物初学记》等。该报于1909年还详细报道了政府镇压嵊县东乡民变的经过。《绍兴公报》终刊于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

3. 《越恨》：为革命者鸣不平

另有《越恨》，1909年创刊，创办人及刊行情况已不可考，现存一期，主要内容是反映徐锡麟、秋瑾被捕后的惨案，反对地方官吏暴行，反清革命的立场十分鲜明。存世的一期有长篇通讯《奇冤录》一篇。^②

（四）金华的进步报业

辛亥革命时期金华的民间活动主要与当地会党龙华会有关，成为浙江辛亥革命的重要力量之一，而且龙华会受到以绍兴籍人士为主的光复会的影响较大。在革命宣传上，金华较有影响的是《萃新报》和《东浙杂志》。

《萃新报》创刊于1904年6月27日，由金华名流、革命党人张恭主持创办，政治倾向鲜明，文章言词激烈是该报的特色，内容上大力宣扬民主共和，鼓吹民族革命。其激进立场在创刊之初就明确表现出来，如《发刊词》中说：“社会腐朽，可谓极点！同人鉴之创《萃新报》，采辑海内外新报之学说丛谈，为我桑梓同胞作警醒钟，作渡津筏。异日者，跳出黑暗界，步行红日中，或起点于是欤！”由于创办人的社会影响力和所刊文章的大胆敢言，该报在金华及周边地区影响很大，也是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省内颇有影响的一份革命派报刊，1904年9月因言词激烈而被官府查封，后改头换面为《东浙杂志》出版，终刊时间不详。

（五）湖州的进步报业

辛亥革命时期，湖州的革命志士创办的进步报刊有《湖州白话报》、《南浔白话报》。

《湖州白话报》创刊于1904年5月15日，发起人有钱玄同等人，该报宗旨是反对帝制，鼓吹共和，反对列强侵略，发扬爱国精神。提出“扬大汉之天声，述亡国之惨史”，积极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与主张。该报刊登过一批有影响的反清文章，也偶登译文和科技文章，如《黑奴吁天录》和《烧柴炭避烟法》等。现存《湖州白话报》第一期，从其“发刊词”可看出其宗旨及语言特点，摘录一节如下：

独有我们湖州 地方又偏僻 看各种报又不便当 又没有自己开的报馆 外头吵的翻天覆

① 《招请绍兴府下各县各镇访事人》，载《绍兴白话报》第14期。转引自王文科、张扣林：《浙江新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② 《招请绍兴府下各县各镇访事人》，载《绍兴白话报》第14期。转引自王文科、张扣林：《浙江新闻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8页。

地 我们的湖州人 还在梦里睡觉 岂不可恨啊……我和几个朋友足足商量了好几天 大家都说道 开报馆是能够感动人的 若是把天下大势 一项一项的登下去 使得个个人买一本去看 这些看报的人 见了那外国人欺侮中国的情形 自然良心发现 必定要发愤起来了 但是不能够说得明白晓畅 也是不中用的 所以我们这种报 专用白话 好叫女人家小孩子向来不大考究文法的 也可以一目了然 这就是湖州白话报的意思了(原文无标点)。^[3]

《南浔白话报》是与《湖州白话报》几乎同时出现的另一份白话报纸,创办人为金涛钦。两份白话报都只出版一年左右即停刊。

二、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籍留学生办报及省外办报

(一) 留日学生办报

19世纪末20世纪初,留学日本成为一股热潮,打破了留学去向美欧日“三足鼎立”的原有格局,形成以留日为中心的全面留学运动。据统计,辛亥革命前夕,浙江省留日学生已近千人,居各省前列。^[4]

留学生报刊在19世纪末开始出现,随着留学人数增多,报刊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辛亥革命时期达到高峰,有影响的达到近50种。在众多的留学生报刊中,留日学生报刊在数量、质量和内容等方面更为丰富,革命气息最浓。有研究者认为,近代留学生报刊的显著特点一是多集中在辛亥革命前期,基本以月刊为主;二是报刊内容从爱国主义逐渐过渡到革命主张,且地方色彩浓厚。^[5]浙江省是留日学生最多的省份之一,浙江籍留学生创办报刊较为积极。影响较大的是秋瑾的《白话》、章太炎的《教育今语》和浙江同乡会编辑的《浙江潮》。

1. 秋瑾创办《白话》

1904年9月24日,秋瑾在东京创办《白话》月刊,一方面揭露和批判清王朝和帝国列强,宣扬爱国主义和民族革命;另一方面号召妇女解放和发展教育。

为示其立场激进并表示对清政府的反抗,《白话》从一开始便不用光绪年号,采用干支纪年。在该杂志上秋瑾发表了《敬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提倡女学,宣传反清爱国思想。该刊第1期刊载了题为《日人胜,俄占领我土》的评论,尖锐指出:“俄国人虽然打仗只得死人,却不失地;可怜我中国,没头没脑的赔死了多少人,白失了多少地,反说我中立无事。敬贺日本,以为是东亚的荣耀!岂不避了一个大老虎,来就小狼么?大老虎吃人的,小狼就不吃人么?你道危不可危。奉劝大家不要前门避虎,后门进狼呵!”

《白话》在痛斥外来侵略者,提倡发展教育的同时,号召妇女们起来与束缚和禁锢妇女的旧礼教、旧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白话》共出版6期后停刊。

2. 留日浙江同乡会创办《浙江潮》

《浙江潮》是由浙江留日学生的浙江同乡会编辑,1903年在日本东京出版,是大型综合性、知识性杂志,主编为蒋百里,孙翼中、叶澜、许寿棠等人参与编务或撰稿。据记载,蒋百里为《浙江潮》所写的发刊词,情文并茂,传诵一时。^[6]该杂志32开本,月刊,每期约8万字,行销国内,鲁迅先生的第一批作品《斯巴达之魂》等,即发表于《浙江潮》。

《浙江潮》在发刊词中声明其办刊宗旨为:“近顷各报其善者类,能输入文明为我国放一层光彩……本志立言,务着眼国民全体之利益……欲争自由,先言自治……先以浙江一隅为言,此非有所畔

域，限于所知也。”^①表明了其放眼世界，输入文明，依托浙江，争取自由的目标。《浙江潮》以挽救中华民族、振兴中华民族为己任，在鼓吹民族主义、推翻满清王朝的同时，着重揭示了天下大势，促使人们树立危机感。因此，众多介绍世界各国，介绍世界最新之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文章，在《浙江潮》上不时刊出。《浙江潮》的这些文章，为革命党人掌握斗争的理论武器作出了重大贡献。^[7]

3. 章太炎创办《教育今语》

章太炎1910年3月10日创办《教育今语》于东京，参与者还有浙江籍留学生陶成章、钱玄同等。杂志的宗旨是给一般失学者灌输文字学和历史学方面的国学常识，并提倡种族革命，同时还作为革命组织光复会的通讯机关。《教育今语》出版5期后停刊。

（二）浙江籍革命者在省外的办报活动

辛亥革命时期，上海是国内新闻业的中心，也是革命宣传的重镇。特别是1900年以后，清王朝的控制力日渐衰微，加上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和存在租界的特殊条件，许多革命派报人纷纷从海外和全国各地赴上海办报。浙江更是具有地理上的天然优势，因此一些浙江籍革命者也把参与在沪办报和报章写作作为投身革命的一个重要途径。

1. 陈其美参与创办《民立报》

陈其美，浙江湖州人，同盟会员，上海光复的领导者之一，有“四捷”^②之美誉。辛亥革命期间，陈其美先后在汉口、上海等地筹办、创立或与别人合办了四、五种报纸。其中之一就是被毛泽东誉为“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8]的《民立报》，该报还与《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合称“竖三民”，闻名于新闻界。

《民立报》创刊于1910年秋，是陈其美与于右任、宋教仁等人共同创办，作为革命宣传的喉舌，陈其美自任访事（即采访记者）。上海光复前夕，《民立报》既是中部同盟会的机关报，报社也成为联络全国革命的阵地。^[9]

2. 陈训正、陈布雷创办《天铎报》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同盟会宁波籍会员在上海创办了多家革命报刊，如1910年10月，陈训正和汤寿潜在上海创办《天铎报》，鼓吹国民革命。陈训正任社长，聘李怀霜为总编辑。武昌起义爆发后，《天铎报》立即树帜响应，当时上海的一些报纸称义军为逆军，《天铎报》则勇敢地与反帝反封建的民众站在一起，陈训正之堂弟，时任编辑的陈布雷则挥笔写了以《谈鄂》为题的10篇言论，欢呼专制政体倒台并热情歌颂武昌起义的历史功勋，给民众极大鼓舞与启迪，也使《天铎报》成为当时上海地区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南京成立，孙中山就职时公布的《告友邦人士书》，即由该报首先发表。

民国初期，《天铎报》一度成为中国社会党在上海的机关报。但该报始终坚持反对袁世凯卖国独裁的立场，积极支持反袁斗争。1913年5月29日，上海起义军攻打制造局战事失败，《天铎报》被迫停刊。

3. 蔡元培在上海的系列报刊活动

清末翰林出身的绍兴人蔡元培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和学者，维新变法失败后，蔡元培的思想由改良转变为革命，并成为激进的革命者和报人。他先后参与创办了多份革命报刊，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很大影响。

① 原载于《浙江潮》第一期，转引自豆瓣读书《〈浙江潮〉发刊词》。

② 即口齿捷、主意捷、手段捷、行动捷。

1901年10月中旬至11月间,蔡元培与张元济、赵从藩、杜亚泉等创办旬报《开先报》,这是蔡元培办报活动的开端。

1903年,蔡元培又参加陈范接手的《苏报》,协助其改版转型,并与章士钊、章太炎等人一道将这份改良报刊转向宣传革命。他撰写的《释“仇满”》及与章太炎、柳亚子、邹容等合撰的《驳〈革命驳议〉》等文章,皆言辞激烈,极力宣传反帝、排满、革命。

1903年12月,蔡元培又在上海创办了《俄事警闻》,是一份清末反帝拒俄革命团体“对俄同志会”(后改名争存会)的机关报,大力宣传反帝爱国,特别指出:“若夫俄,则尤虎狼之尤者也。”提倡种族光复,保存国粹。1904年2月该报改名为《警钟》,1905年3月因揭露德国侵占山东权益被查封。

4. 张元济在上海的报刊活动

张元济,浙江海盐人,跟蔡元培一样是清末翰林出身。因为成功经营商务印书馆,并利用出版业推进民族文化和国民教育,他成为中国出版界高山仰止的人物。张元济大体是一个改良主义者,并且终其一生都无大的改变,但其大半生秉承教育国民的宗旨经营出版事业,其观念和行止远不同于一般的清朝遗老和保守人物。他在经营商务之前和期间,也多次创办报刊,作为出版书籍之外表达政治观点、推进文化和教育的另一途径。其报刊和书籍出版活动虽未直接倡导革命,但其国民教育理念的践行无疑有助于社会进步和革命事业推进,并或许能给政治革命的中国提供一些理性、平和的平衡力量。

1901年,张元济在上海与蔡元培等创办《外交报》,宗旨是为世人“欲审国势,诌外情,出文明手段,以尽排外之天则”,明确提出“文明排外”的主张,并引发社会关注和知识界的争议。1902年,张元济协助夏瑞芳创办《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并大获成功。《东方杂志》初创时打出“启导国民,联络东亚”的旗号,与当时国内高涨的“拒俄运动”有关,但主要还是根源于张元济“文明排外”主张。

5. 邵力子在上海的报刊活动

邵力子,绍兴人。1907年邵力子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同于右任合作,相继创办了《神州日报》、《民呼日报》、《民吁日报》,宣扬民权、共和思想,倡导国民独立精神。邵力子承担发行、编辑等工作。辛亥革命胜利前后,邵力子参与创办《民立报》,继续宣传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办报的处境十分艰难,报纸印费常无来源。邵力子爱报如命,将自己身上的皮袍脱下拿去变卖支付报纸印费,朋友们说他是“毁家办报”。在参与创办“竖三民”的过程中,邵力子以辛辣犀利的文字针砭时弊,很快闻名大江南北。

6. 虞和钦在上海创办《科学世界》

1901年,宁波北仑人虞和钦、虞辉祖、钟观光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个自办的科学仪器馆。内设标本制作所和模型制作所,制作的动植物标本及模型供给京、津、沪等地的高等学府教学、实验之需。1903年,虞和钦依托科学仪器馆创办了《科学世界》杂志,并担任主编。这是近代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期刊之一。

虞和钦(1879—1944),名铭新,字和钦,北仑大碶人,我国近代知名化学家。1899年,他联合同道在家乡创办“四明实学会”,开始学习研究理化博物知识。1905年虞和钦东渡日本学习化学,毕业回国后曾任翰林院检讨、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等职。虞和钦毕生刻苦钻研,潜心著述,著有《和钦全集》18种。^[10] 虞和钦早年曾担任由蔡元培等创办的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的教员,还是《宁波白话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科学世界》设有“图画”、“论说”、“原理”、“实习”、“拔萃”、“传记”、“教科”、“学事汇报”、“小学”9个栏目,内容均与自然科学有关。其宗旨是“发明科学基础实业,使吾民之知识技能日益增进”。《科学世界》在办刊过程中反复阐述发展技术的重要性,指出现在世界已进入电气时代,

若要求强求富，就必须发展科学，兴办实业，只有这样才能救亡图存。他希望中国借鉴日本重视科学发明和犹太民族长于商法的经验，提高国民学习技术的自觉性。《科学世界》登载有爱迪生、瓦特、马可尼等发明家的事迹，激励国人奋发向上、顽强拼搏。

《科学世界》注重对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介绍，内容涉及“物质不灭”、“气体性质”、“电的知识”、“X射线”、“电离”、“电解”、“原子价”、“溶液”、“热化学”、“植物受精原理”、“植物的营养物质”、“神经之物理学说”、“动物学之效用”、“原生物”等。《科学世界》也发表过一些国内学者撰写的科学论文、科普文章及介绍国内科研、工艺、教育活动的文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虞和钦曾为该刊写过《中国地质之构造》一文，将我国的地貌、地史和地质构造向读者做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叙述清晰，通俗易懂，文末还附有一份“地史统系表”，是本世纪初研究中国地质构造的一篇重要文章。

《科学世界》还十分重视对科技制造方法的介绍，如景泰蓝造法、鞣皮术、樟脑制造法、干电池和电石（碳化钙）、“人造黄金”、“人造砥石”、“人造大理石”、“人造象牙”、“人工宝石”、“人造玛瑙”等，对我国皮革化工、樟脑生产等工业的发展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科学世界》共出版17期，1922年终刊。

三、辛亥革命时期浙江报业及报人的特点

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总会在其民众具体的文化行为中表现出来。或者说，来自同一地域的人在特定的时代和事件里往往有着较为相似的反应。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籍进步报人的报刊宣传活动也自然表现出一些可以归纳的共同点。

（一）报刊言论和行为异常激进

近代中国，从晚清到民国，一路走来，无论是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都有十分浓厚的“激进”底色，先是民族革命压过了改良立宪，后是救亡图存压过了文化启蒙。革命较之于改良，原本就是一种激进的态度和行为。从这个意义上讲，辛亥革命本身就是激进运动，但在整个革命的酝酿和发展过程中，浙江籍革命人士和报人群体表现出比其他省份报人更为激进的姿态。

1. 激进异于常人的章太炎

早年支持康、梁维新变法的章太炎在变法失败之后态度大变，成为一个激进的革命者，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诸多行为之激进可谓非常人能及。如1900年毅然剪去发辫并参加唐才常组织的中国议会、在报纸上刊登惊世骇俗的征婚广告、1903年撰文引发的“苏报案”、1906年东渡日本主持《民报》编务、1910年与陶成章重组光复会并与同盟会分裂、1912年的“暂行报律事件”及相关的报刊言论，无不表现出异于常人的激进一面。毛泽东曾在谈话中认定章太炎为“激进的革命派”，^[11]刘再复则认为章具有“激进的民粹主义思想”，^[12]总之“激进”二字已成为后人概括章太炎的标签之一。

2. 浙江留日学生的激进主张与行动

以绍兴籍留日学生为主的光复会是辛亥革命期间最为激进的革命组织，从其主要成员陶成章、章太炎、蔡元培、徐锡麟、秋瑾等人的行止和报刊言论中也可窥见大概，如主张暗杀、鼓吹暴力革命、激烈的排满立场等，总体上都比其他省份的革命者表现更为突出。

浙江同乡会所办刊物《浙江潮》在当时的留学生报刊中也是较为激进的一份，时在日本求学的鲁迅就曾在《浙江潮》上发表他的第一篇小说《斯巴达之魂》，以古代斯巴达人不惜以身殉国、反抗侵略的精神来激励留日学生和广大中国青年热爱祖国，反抗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同为绍兴籍的秋瑾、陶成章、徐锡麟等人的诗文中也充盈着激进的革命热情和自我牺牲精神。

3. 其他浙江籍激进报人

陈训正、陈布雷兄弟是出身宁波慈溪的两位激进报人，辛亥革命时期，陈训正在宁波主持创办的

《武风鼓歙》(1911)、在上海创办的《天铎报》(1910),都有言论激烈、主张激进的特点。陈布雷少年时便思想激进,曾与同学组织“覆满同志社”,宣誓“驱逐鞑虏,还我中华”,后任《天铎报》记者的半年里,其《谈鄂》十篇讴歌革命鞭挞封建,其言辞之激烈、激情之充沛,使出版仅一年的《天铎报》迅速成为上海最受欢迎的报纸之一,也使年轻的陈布雷名动新闻界。

举人出身的张恭少年时代就表现出十分激进的一面,1904年主持创办的《萃新报》也以言词激烈而闻名,创刊之初就宣扬民主共和,鼓吹民族革命。终使该报出至第6期被封,成为浙江近代史上第一家被封的报纸。

另一位浙江籍报人,即1927年后成为蒋介石政府高参的戴季陶在辛亥革命时期也是不折不扣的激进青年。他曾在1912年5月的《民权报》上以“天仇”之名发表短文《杀》。全文曰:“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此四人者中华民国国民之公敌也。欲救中华民国之亡,非杀此四人不可。杀四人而救全国之人,仁也;遂革命之初志,勇也;慰雄鬼在天之灵,义也;弭无穷之后患,智也。革命初成,不少健儿,以全国之国民而无人敢诛此四贼,以救全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以保五千年荣誉之历史乎?吾殊不敢以此诬我国民也。”字里行间彰显的是鲜明的激进主张,还带着明显的非理性色彩。

(二) 办报业务上开拓创新较多

辛亥革命前后,我国报业迎来一次高潮,报刊种类和数量均有大幅上升,而浙江的情况更为突出,尤其是在报刊品种开拓上,取得了一些突破,在我国近代新闻传播史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如白话报刊、妇女报刊、专业报刊的创办,特点颇为鲜明。

1. 白话报刊

中国人自办的白话报刊始于戊戌维新时期,有《演义白话报》、《平湖白话报》、《无锡白话报》、《通俗报》、《女学报》5份。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在文化程度不高的会党、城市贫民和新军中进行革命宣传,创办了一批白话报刊,其主持者多是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成员或同情革命的报人。

浙江籍革命者和报人在此期间创办的白话报刊有十余份,数量居全国各省之冠。如《平湖白话报》(1987)、《杭州白话报》(1901)、《绍兴白话报》(1903)、《宁波白话报》(1903)、《湖州白话报》(1904)、《南浔白话报》(1904)、《浙江白话报》(1908?)、《白话新报》(1910?)、《浙江白话新报》(1911),还有秋瑾在日本创办的《白话》月刊(1902)。浙江省如此集中地出现白话报刊,恰好说明当时浙江的革命报人已明确意识到通过报刊宣传来发动社会中下层力量参与和支持革命的重要性。

因此,有论者认为:唤起民众是辛亥革命领袖们所强调的,也做了不少工作,但由于这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局限性,就全国而言,发动的面与深度都有限,比起其他省区,相对而言,浙江的发动则是较好的,说是全民觉醒、全面发动也不为过。这一方面原因是浙江的社会条件有某些优越之处,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光复会自始至终立足浙江,面向内地,做了大量的发动工作。^[13]

2. 妇女报刊

妇女报刊是指由妇女创办、发行并以妇女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报刊。维新运动时期,中国已出现妇女报刊,宣传女性解放思想,如康同薇的《女学报》(1898),但因无群体支撑,未成气候。变法失败之后的1902到1912十年间,中国的妇女报刊蓬勃发展,形成一个高潮,全国各地陆续出版的妇女报刊共有43种。^[14]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女子世界》、《中国女报》、《神州女报》、《女报》等。《中国女报》和《神州女报》都与秋瑾直接相关。

1907年1月14日,《中国女报》在上海创办,秋瑾任主编兼发行人。该报称:“本报之设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辟有《社说》、《译

编》、《文苑》、《新闻》等栏目。该报以通俗易懂的文字鼓吹妇女解放，呼吁妇女走向社会，争取人格和尊严的独立。《中国女报》创刊后虽然只出版了两期，但影响颇大。1907年3月，该报因秋瑾被捕而停刊。

1907年12月，上海又出现《神州女报》，为金能之、叶似香二人合办。此二人籍贯不详，但其办报缘由却仍与秋瑾关系密切。该报是当时上海妇女界为纪念秋瑾，将《新女子世界》和《中国女报》合而为一而出的新刊。据该刊发刊词说，当初，《新女子世界》创办人见到秋瑾，提出愿与秋瑾合作，“既得见女士，则从容言，愿《女子世界》为附庸，女士诺之。议未成，皖事起……”可见当初二刊原想合刊，却因秋瑾牺牲而终未成。秋瑾牺牲后，《新女子世界》的创办人不负前诺，将二刊合而为一，“以尽女士之志”。^[15]《神州女报》1908年3月停刊，共出3期。

3. 专业报刊

专业报刊的出现可以说是革命年代的意外收获，因为它们往往置身于革命的洪流之外，以追求学术并传播专业知识为宗旨。除前文提到的宁波人虞和钦在上海创办的《科学世界》杂志之外，辛亥革命时期温州也出现过三份专业期刊。

辛亥前后的温州报业在直接参与革命宣传上并不抢眼，据现存史料，除民国建立后的1912年初创办了《东瓯日报》外，整个辛亥革命期间都没有其他报刊存在，更没有宣传和推进革命的报刊。但温州报人却在专业报刊领域为浙江省新闻界，乃至为全国新闻界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3份为温州新闻业赢得了名声的专业报刊分别是陈虬1897年1月创办的《利济学堂报》，黄庆澄先后创办的《算学报》（1897）和《史学报》（1899）。

3份专业报刊可谓特色鲜明，地位也不俗。《利济学堂报》是浙江最早的专业报刊，而且还是浙江省内国人自办报刊之始，所以意义非同一般。《算学报》和《史学报》是我国同类专业报刊之开山祖。而且，3份专业期刊并未局限于专业视野而是政治上有所追求。陈、黄二人都是维新派，志在改良。3份期刊虽有改良倾向，但仍处在本文所界定的辛亥革命时期内，而且身份特殊，故笔者将其纳入分析，其他改良报刊则不循此例，特此说明。

（三）浙江籍报人群体规模大、名声响

从辛亥革命到民国，浙江涌现了一批著名的报人，综合前文，这个群体的代表性人物有：杭辛斋、项藻馨、蔡元培、章太炎、张元济、陶成章、秋瑾、陈其美、戴季陶、孙翼中、邵飘萍、钱玄同、项士元、陈训正、陈布雷、潘公展、庄禹梅、金臻庠、王子余、张恭等，另外还有虽在辛亥革命时期步入社会，但其办刊活动集中在民国时期的严独鹤、邵元冲、潘公展等。他（她）们当中，大部分具有全国声誉，对于辛亥和民国时期的中国报界、政治界和文化界都形成有力的影响；其余则在浙江省内或某一地区的报界、文化界、政界和教育界有较大影响，总之他（她）们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

上述辛亥报人，有的终生以办报或出版为业，如张元济、邵飘萍、严独鹤、庄禹梅、金臻庠等；更多的则在革命成功后由办报而从政。但不论其后来的职业选择如何，他们早期的报刊活动都是构成中国新闻史的一个重要部分。

四、浙江籍报人对辛亥革命及民国新闻事业的贡献

（一）有力地宣传并推动了辛亥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功虽在武昌，但其前期的革命宣传、组织发展及其核心成员的革命活动主要还是在日本和上海两地完成，同盟会成立后情况更是如此。孙中山早年迷信暴动并多次组织实施，其结果十分悲壮效果却并不理想，1900年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后，他才开始重视报刊宣传的作用。此

后,尤其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宣传的中心除了日本东京外,还有国内的重镇上海。

相近的海洋文化特质使浙江与上海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晚清以来,开埠通商后的上海一跃而成为国内举足轻重的城市,其报刊业也在19世纪末取代香港成为华文近代报刊出版的中心。如此一来,浙江读书人到上海寻求发展便成为必然,特别是科举废除之后。所以,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籍报人依托大上海,并成为革命宣传的核心力量也就可以理解了。

1903年的“苏报案”是辛亥革命时期社会效果极佳的宣传事件,其主角便是章太炎和邹容二位,而“苏报案”的导火线正是章太炎在《苏报》上撰文介绍邹容的《革命军》及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文章。

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一共出版了26期,第1—5期由胡汉民主编,第6—24期由章太炎主编(其中第19—22期由陶成章代理主编),25—26期由汪精卫主编。也就是说,在《民报》存在的5年里(1905—1910),四分之三的编务工作由浙江人章太炎和陶成章主持。

革命前夕,上海的革命报刊为革命鼓呼更加激烈,其间也活跃着一群浙江籍报人的身影,如蔡元培在上海创办的《俄事警闻》和《警钟》,陈训正、陈布雷兄弟分别在《天铎报》担任社长和记者,陈布雷并负责撰写社论和时评;戴季陶先后担任《天铎报》和《民立报》主笔;邵飘萍担任《时事新报》撰稿人;陈其美创办《中国公报》、《民声丛报》,还参与创办《民立报》并自任记者;邵元冲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这些报纸都是20世纪初推动革命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宣传阵地,它们所刊登的言论文章对于革命进程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正所谓“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二) 丰富并发展了我国近代新闻业和新闻史

近代的革命事件都与新闻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革命的行动背后必然有大张旗鼓的革命宣传,而宣传与新闻至今还是一对扯不清关系的难兄难弟。革命时期的新闻业也因斗争形势多变而显得千姿百态和云诡波谲,也格外引人注目。由于我国近百年来革命运动和战争不断,社会持续动荡,因此我国近代新闻史的革命史特征十分鲜明。反过来说,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成为我国新闻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使我国的新闻史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革命爆发的年代,往往是政治、文化控制力衰微的年代,这就给以自由为内在要求的新闻业留出了长足的发展空间。辛亥革命时期我国新闻业迎来一个高潮,这已是诸多新闻史研究者共同的结论。而这一时期,尤其是20世纪初的10年,东京和上海作为革命宣传的重镇,杭州、绍兴和宁波也均在上海的辐射范围之内,浙江籍革命者作为留学生在日本的宣传活动,以及他们回国后在上海、杭州、宁波、绍兴、湖州、金华等地创办或参与的革命报刊,如《浙江潮》、《白话》、《民报》、《苏报》、《汉民日报》、《浙江白话报》、《民立报》、《天铎报》、《武风鼓歙》、《朔望报》、《中国女报》、《绍兴白话报》、《湖州白话报》、《萃新报》等,都成为载入中国新闻史的重要报刊。

这一系列报刊及报人群体的名垂青史,不仅在于其革命的立场和革命宣传活动本身,还在于其对于报刊和新闻业务所做的贡献,如这一时期新闻写作与传统文学体裁脱钩、时评风格的发展与定型、专业报刊的创办、报刊经营等都构成了我国近代报刊新闻业务的一笔经验财富,显得弥足珍贵。

但这一时期的新闻业,包括浙江的新闻业都有值得反思的成分,那就是革命年代的新闻宣传往往带有明显的实用理性和工具理性特色。革命者办报以革命的结果和目的为重,来不及深入思考报刊应有的价值及其对于社会和普通民众的意义,工具理性盖过价值理性,目的盖过手段。这在革命斗争形格势禁、风云变幻的年代当然无法苛求,但我们今天回望历史,不能不有所察觉,并引以为戒。

(三) 为民国报业奠定了基础

辛亥革命缔造了中华民国,虽然民国的民主与共和事业历经磨难与反复,但也磕磕绊绊走过了近四十年。这一时期已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也是中国近代的精英人士为寻求现代化道路

艰苦探索的历史时期。在民国的政治及社会舞台上活动的主要群体，大多经历了辛亥革命的洗礼，新闻界也一样。民国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政党政治年代，党派林立，党争不断，这些都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或后遗症，也可以说是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与帮派政治的延续。而这些特色也都会在民国时期新闻事业中反映出来。

与全国的情况类似，有一批在辛亥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报人或出版家进入民国后继续以办报或出版为业，如张元济、邵飘萍、严独鹤、庄禹梅、金臻庠；另一些则时在政界，时入报界，成为两栖式的人物；有些则以办报为进退之道，如陈训正，在宁波军政府成立并任职后，又于1921年赴上海创办《商报》，其堂弟陈布雷则任该报的编辑主任，后两人都进入浙江政界任高官，但陈布雷又在1928年辞官到上海任《时事周报》总主笔，并创办《新生命月刊》。邵元冲辛亥革命时任《民国新闻》总编辑，后参加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又回上海任《国民》杂志编辑，1925年到北京任《民国日报》社长，1928年又在上海创办《建国》周刊并任社长，期间也在国民政府担任官职。从这些浙江籍人士的报刊活动中，也大体可以看出民国与辛亥的延续性。

报人向政府官员或幕僚转变，是革命成功后的普遍现象，也无形中显露出中国报人和政治家内心深处以报刊为工具的实用理性痕迹。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是一个可以讨论和引人深思的文化现象。报刊与政治、报刊与人、报刊与社会的关系始终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话题，只是在革命年代总是有意无意被一些宏大议题或弥漫的工具理性所遮蔽罢了。

但是，辛亥时期的一批重要报人仍以全职或兼职的身份从事民国时期的报刊活动，这至少说明辛亥时期的报业实践在三个方面为民国时期的报业打下了基础：一是人才，民国时期的报业精英大多与辛亥时期的报业实践有着一定联系，或接受了辛亥一代报人的教育与影响；二是办报技术，辛亥革命前后，正是我国大量引进西方报刊操作理念与方法的阶段，民国时期只是走向了更高程度和更大规模的商品化运作；三是报业经营的理念与方法。

五、结 语

浙江籍革命者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起过相当的作用，这是基本可以肯定的，也是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者比较一致的结论。^①从组织上讲，辛亥革命的领导机关同盟会的三大来源之一就是浙江的光复会，虽然光复会作为政党组织在革命后不复存在，但其成员却有很多仍在同盟会和国民政府（包括地方政府）中担任要职；从革命时期的报刊宣传来讲，浙江籍报人的确在革命宣传上付出了很大的努力，也收到了很积极的效果，上海的中心地位及其与浙江的地缘关系也无形中突显了这一效果。

除了地理和地缘因素外，我们认为还有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原因。从世界范围来看，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往往以海洋文化为先导。因此浙江人在辛亥革命中比一般省份的人士表现更为激进和活跃，发动群众的工作和民间组织的参与程度也相对更高。这一事实也可作为辛亥革命时期浙江的报业发达及浙江籍革命者在省内外踊跃参与报刊，并有助于革命活动的一个证据。但这一时期的革命报业发展过程中，也有值得检讨与反思之处，一是革命报人有意无意地对报刊多持工具态度，并不充分尊重报刊与新闻的内在规律和应有的价值，二是革命期间的报人之间党争激烈，地域意识也过于浓厚，未能因革命的伟大解放事业而团结一心，因而带来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这些都为我们后来者回顾历史、研究历史提供了值得深入思考的话题。

^① 参见《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上两篇文章：一是胡国枢的《浙江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二是金冲及、章开沅的《史家论浙江辛亥革命》。

参考文献:

- [1] 汪荣祖. 革命是最猛的一剂药 [N]. 南方都市报, 2011-04-22.
- [2] 王文科, 张扣林. 浙江新闻史 [J].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47.
- [3] 徐重庆. 钱玄同办《湖州白话报》 [EB/OL]. 中国旧书网旧书社区, http://www.jiushu.cn/forum/m_show.php?tid=12939.
- [4] 何扬鸣. 论浙江留日学生 [J]. 浙江学刊, 1998 (3).
- [5] 涂江莉. 论近代中国留学生报刊的内容、特点及其作用 [J]. 汕头大学学报, 1994 (4).
- [6] 铁血社区: 蒋百里 [EB/OL]. http://bbs.tiexue.net/post2_2369399_1.html.
- [7] 何扬鸣. 浙江留日学生与辛亥革命 [J]. 杭州大学学报, 1996 (6).
- [8] 埃德加·斯诺. 西行漫记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79: 115.
- [9] 方汉奇. 中国近代报刊史 (下册) [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492.
- [10] 谢振声. 创造多项中国之最的虞和钦 [J]. 宁波通讯, 2006 (3).
- [11] 斯夫, 张树成. 毛泽东为何在“大跃进”时期重提“苏报案” [EB/OL]. 人民网,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028638.html>.
- [12] 刘再复.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历史角色的变迁 [EB/OL].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03896>.
- [13] 胡国枢. 浙江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与作用 [J]. 浙江学刊, 2001 (5).
- [14] 樊娜. 1898—1918 年中国妇女报刊的兴衰史 [J]. 人才资源开发, 2010 (6).
- [15] 李九伟. 《神州女报》的两个版本 [J]. 出版史料, 2005 (4).